

长篇纪实文学 刘书良 著

行走的丰碑

关于一个老年科技群体的记忆



學苑出版社

行走的丰碑

——关于一个老年科技群体的记忆

刘书良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的丰碑：关于一个老年科技群体的记忆/刘书良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077-3296-2

I. ①行… II. ①刘…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1734号

书 名：行走的丰碑——关于一个老年科技群体的记忆

作 者：刘书良

责任编辑：郑泽英

封面设计：蔡 超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河北省廊坊市飞腾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87mm×1092mm 16开

印 张：16.63

字 数：280千字

印 数：5000册

版 次：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3.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春天，为老科技工作者而感动 (3)

1. 背景：历史与自身的双重推力
2. 中国最大民间组织诞生记
3. 各方关注：跨越世纪的影响，超越时代的意义

第二章 在坚持中走向辉煌 (23)

4. 场地之痛，折射创业之难
5. 来自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鼓励
- 6 “绝版”迎春茶话会
7. 评职称，还老科技工作者一个肯定的人生
8. 建立省级组织，迈出老科协事业发展的第一步

第三章 九号文件，创造老科技工作者自己的历史 (43)

9. 老科协历史上最光芒夺目的篇章
10. 对9号文件的“武汉式”解读
11. 借9号文件东风，催动辽宁“雄鹰效应”
12. 江西老科协：21世纪的“政策资本家”

第四章 布点星火，组织建设的湖南式样板 …… (70)

- 13. 树旗帜，引来凤凰筑大巢
- 14. 搞试点，摸准石头过大河
- 15. 见成果，抓好典型成大事
- 16. 重效应，有点有面立大功

第五章 辽宁，一个实体论者的现实主义梦想 … (87)

- 17. 也有辉煌且实实在在
- 18. 一场价值八千万的教训
- 19. 不经涅槃哪得重生？
- 20. 教训无独有偶，办实体岂是一帆风顺？
- 21. 二次兴城会议：理性的回归
- 22. 辽宁模式，靠得住！

第六章 爱党爱国，建言献策，共谋民生发展大计 (117)

- 23. 沼气服务体系建设：利国利民，功在千秋
- 24. 农田水利建设：与大江大河对话
- 25. 开发“三江一湖”再造东北粮仓
- 26. 煤炭生产安全建议：为生命大喊一声
- 27. 立项建设黔中水利枢纽工程
- 28. 江西：提建议当好参谋，献计策促进发展

第七章 服务“三农”，我们可以这样说 ……… (136)

- 29. 湖南：擎起华南服务“三农”的一面大旗
- 30. 山东：在实践中创建服务“三农”的黄金定律

- 31. 辽宁：工业上“辽老大”的“三农”威风
- 32. 江西：矢志发展作贡献 服务“三农”见真情
- 33. 中国农业科学院：打造中国的农业硅谷

第八章 科学家们在讲说 (191)

- 34. 认清形势，认识自己，认定目标
- 35. 科普宣传，有这样一支好队伍
- 36. 北京老科总：科普宣传的领头雁

第九章 一座丰碑，就是一段历史；丰碑永在人间， 历史永不忘记 (209)

- 37. 刘劲凡：生命，不朽！
- 38. 刘元岐：把生命献给江河
- 39. 刘珍自述：我的故事
- 40. 潘久灿、苏志艾：十万老区农民的丰碑
- 41. 余热生辉放异彩
——记抚州市老科协名誉会长杜润芝
- 42. 秋天里美的宣言
——郑世锴于淑兰夫妇与“中林金桥黄花槐”

第十章 启示录，中国有个老科协 (252)

后 记 (258)

一个老人就是一座图书馆。一个老人去世了，这座图书馆也随之消失了。
这是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论断。

几乎与安南做此番论述的同时，中国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十年的历程，从沿海向内陆推进呈现出一片日新月异的繁荣。与这一切紧密相连的，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每一步都伴随着轰然巨响。

这个含蓄古老的神秘民族，究竟要给世界再造一个什么样的东方神话？全世界所有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好奇？惊讶？不安？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旧以她的哲学领导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把她从一百多年前的屈辱和十多年前的动乱中解脱出来，从容地、智慧地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知道，十年“文革”给刚刚从三座大山底下挣脱出来的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这个历史上有过辉煌也不乏坎坷的民族因此备受折磨。一批又一批科研领域里的科学家、生产一线上的技术骨干倒下了，继之科研意志萎靡了，科学精神崩溃了——某种意义上，这个时候才是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

一个没有科研实力的国家要想在国际舞台上不受歧视和屈辱，就如同一个文盲要在当今高科技时代谋求好工作一样，又岂止是难上加难！在各类高科技突飞猛进的知识大爆炸时代，我们的科学研究从人员到实践却出现了十年断层！宛如横亘在中国经济命门上的一块巨石，对于中华民族重返国际舞台中心来说，这是一座必须推倒的大山。

1977年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历史的季节，中国人民迎来了中国科教大发展的春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打开了尘封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

科教打头阵，国家才会进入操作层面上的全面发展，当今各主要发达国家走向富强繁荣的根本经验表明，科教强国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也同样在人类发展史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1979年的全国科学大会，正式拉开了中国经济复苏的帷幕。这次大会被众多文献称之为“科学的春天”，对于中国而言，其意义和影响恐怕又不止于科学范畴，最重要的是，作为一条必由之路的出发点，从这次大会开始，中国进入了全速发展的春天。30年来，季节可以更替，春意始终盎然。尤其是，人们已经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没有夕阳的春天，是不完整的；老年科技工作者，理应站在科学舞台的重要位置，永不离开。

显然，1982年开始打破干部人事终身制，是社会主义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由此带来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在我国，科技人员是编排在干部序列的，所以这一制度施行之后，一些“卡线”的专家便只有抱憾退后，站到退离休队伍里面和自己朝夕相处若干年的实验室“永别”，其切肤断骨之痛，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我国又是一个人才缺乏的国家，好多刚“卡线”的科技专家正处在科研创造力最强盛的巅峰状态，一朝被“隔离”到科研一线之外，对其本人科技报国的愿望是一个打击，对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更是一个损失。

事实是：科技专家们尽管已年届六十，但聪明才智还在，报效国家的赤子情怀还在，在不同历史时期积累的科研经验和人生阅历还在……要特别指出的是，科学家的人生体验对于其科研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不仅将影响到他们的科研方向和科研热情，而且，生活带给他们的悟性和智慧可以直接影响到科研活动本身；况且，许多重大发明其灵感都是直接来源于生活的。在这一意义上，老年科技工作者因年龄而带来的优势是其他年龄段科技工作者所不能比拟的，并且，按照一般规律和既往实践总结，只要身体健康，50~70岁这一年龄段应该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活跃、最成熟的时候。

把老年科技工作者组织起来，充分实现他们科技报国的愿望和再作贡献的热情，才是从根本意义上体现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战略眼光。

第一章

春天， 为老科技工作者而感动

春天真的来到了，30多年前的春天人们就这样欢呼过，那是“科学的春天，人民的春天”。

上个世纪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被许许多多的中国科技界知识分子美誉为“科学的春天”。

30多年前，在5500多位科学家出席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郭沫若先生作的大会闭幕词——《科学的春天》，不啻是一声振聋发聩的春雷，犹如世纪的强音，他这样告诉世界，贫穷落后的中国，要带领他的人民，作一次胜利的突围。

曾为郭沫若起草《科学的春天》的作者胡平，列举了科学春天到来的四个显著标志，一是充分肯定了科技的重要地位；二是知识分子彻底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成了“香老九”；三是在体制上解决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弊端；四是“派出去，请进来”，科研人员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再也不用政治局委员批准了。

当我们把历史的时针回拨到1986年时，一大批30年代出生的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纷纷离开原来的科研岗位。这大批特殊的智力群体不仅有着精湛的科技知识和经验，而且有着许身为国、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从内心深处渴望迎接像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那样的科学的春天。

1. 背景：历史与自身的双重推手

到1989年，这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解放已经持续了11年，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级阶层都不同程度地收到了改革红利，在农村，万元户已不再新奇；在城镇，大集体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不再受白眼，个体户更是赢得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商家们兜售生意总不忘多说几句“个体的个体的”，以区别“公家的”呆板和生硬，学校里流传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轰轰烈烈的，这个社会主义的红色中国就这样把从经济到政治的诸般体制改革了，把从群体社会到个人意志的日常生活开放了，街面上各式店铺多了，奇装异服多了，外国人多了，菜青色的面孔少了，关注减肥的话题多了。大数学家罗素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美的本源。果然不假。

就像发达国家在自身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一样，中国好似一夜间遭遇了前所未闻的问题：中国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1989年，当时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9100万，一年后将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按国际通行的衡量标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以上，都属于老年型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某种意义上讲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但对于中国刚刚起步只有十年左右历史的市场经济来说，这无异于未富先老。这个趋向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直到现在才被人们不断提及。在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进程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这个进程简直无异于横空跌落或直线上升，引发的問題也是突然而起、猝不及防。

这个提前到来的问题，具体到科技人才的储备与作用发挥上，如果处理不好，势必造成中国科技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破坏力将不亚于类似唐山大地震那样的人才大地震！这无异于一场自断手足自戕枝叶。

在9100万的老年型人口结构中，离退休科技人员已经达到80多万人，当时预计到2000年将达到250万人。这样多的科技人员从科研前线上退下来，他们并非老弱病残已丧失科研能力，也并非学术能力不卓越政治立场不坚定，这只是基于年龄到限新老交替而发生的一次战线大换防。换言之，战斗位置不同了，但不同位置的战斗人员其战斗力并没有差别，所肩负的战术任务和战略目标没有变，那么，怎样把二线上的科研人员的战斗力整合起来并使之强化，发挥出甚至比一线科研人员更好的战斗力，不仅是科技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摆在人事部门乃至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未富先老”是我国人口结构中出现的一个独特问题，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方面真正问题之所在，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以比发达国家少得多的人均财富和长度短得多的时间来应对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空前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后社会将如何发展？这也是一个国际问题。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这个先知先觉的老人在1998年10月1日国际老年人年发起日的献词中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悄悄的革命，它大大超出人口学的范围给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精神均带来重大影响。相对而言，这一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更大，这不仅仅因为现有老年人大多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老龄化速度已经非常之快，并且还将持续下去。

曾任全国老龄委名誉主任、中国老科协名誉会长的陈丕显引用聂荣臻元帅的话说：“人口的老化必将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把老龄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加以领导，统筹规划，综合治理。”

人口的老龄化意味着劳动人口的减少，消费人口增加，社会负担加重。离退休干部每年将以50~70万的速度增长，大批干部退下来，从安置、管理到退休费的开支，对我们国家和整个社会都是沉重的负担。如果还不正视这个问题，不及早动手制订积极而有效的对策，便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不但会延缓四化建设速度，而且会影响社会的安定。

解决老龄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五个“老有”中，养、医、学、乐都是要消费，要花钱的，而“为”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它能体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创造社会财富。我们的宣传就是要让人们充分认识发挥老有所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退休不是工作的结束，而是新生活的开始，在政治上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稳定社会起重要作用，在经济上他们是发展生产的智力大军，可以继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关于老年科技工作者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认识得是多么的深刻啊，在当前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共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家人事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程连昌回忆道：

在1988年前后，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推进的时期，改革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汇入了历史前进的大趋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广大的离退休科技工作者，怎样面对历史赋予他们的机遇和使命呢？那个时候，中国科协、国家人事部、国家科技部、中央组织部也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但有一条是不容置疑的：国家必须重视这支科技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国家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而言，他们是一笔巨大的宝贵的财富！首先，科研才能与物理年龄绝不是直接相关的，这一点

早已成为各个国家各个人群的共识，许多大器晚成的科技工作者即使六七十岁了还在产出着一个又一个的科研成果，并且很多科技工作者到60岁时也许刚好处于科研的最高峰，正是科研成果的丰产期，突然离开科研岗位，对于其本人是一个遗憾，对于整个科研事业来说，则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其次，退离科研一线之后，没有了实验室和实验器材，多年里积累下来的丰富的科研经验和学术才干没有了用武之地，本来再进一步就能获得的科研成果功败垂成，继续从事发明创造的雄心壮志无以释放，贡献社会报效国家的夙愿难以实现，这几百万“流落”到社会上的老科技工作者是人才资源的又一巨大损失。

怎样才能使广大退离休科技工作者老有所为，成为一支科教强国的生力军，被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摆在了政府决策的议事日程当中。

“这些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大都已年逾花甲，经历过旧社会的剥削阶级统治，又沐浴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阳光，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有深切体会；爱党爱国，拥护改革开放，认同科学发展，在政治上成熟可靠坚定；在40年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心血，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虽从一线上退下来，但为国分忧、为民造福的初衷不曾改变，为发展社会主义科技事业尤其壮心未已，雄心更盛；无论个人意愿还是科学经验都具备了担当科研大任的充要条件。”

但是，社会上对退离休科技工作者给予的重视还停留在一个相对不高的水平上，其中上海市是这一状况在全国范围内的缩影。

据上海退离休专家蒋伟明回忆，那时他们从事科研工作的难度相当大，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1990年时拥有会员1695人，他们都是上海各战线、各行业学有专长的老同志，在长期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虽然从体力到学术都还能进一步发挥科研作用，但因为退休年龄已到，便不得不撤到二线甚至离开科研岗位，奔流了几十年的科教强国热血被突然踩了急刹车，那种失落和无奈可想而知。后来虽然加入了“上海退专协”，但大家普遍感觉到从事科研仍有不少障碍和困难：

一是获得情报信息难。退离休以后原单位不再向他们提供有用的、可靠的情况，获取科研信息的渠道被掐断了。虽然通过其他渠道也能获取一些情报，但毕竟有限，也很不及时。情报得不到，知识面得不到更新，就只能面对着一系列的科研项目望洋兴叹。

二是发挥作用的平台缺失。当时上海还没有建立退休人才交流市场，几乎

所有人才市场面对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这些头发花白的老科技工作者没人在意，而事实上他们的经验和学识不知是这些年轻人的多少倍，加之这些老同志、老专家自己是搞研究、做学问的，社会关系比较少，也不善推销自己，使得他们高超的科研水平无法发挥。由于缺乏一个很好的机制和平台，尽管有真才实学，却得不到发挥作用的机会。

三是出版渠道不畅。许多老专家都希望把毕生的经验写出来，以供后人借鉴。但是学术性、技术性的书籍出版难，出版部门往往不是嫌发行量少加以拒绝，就是要求作者自己仓储几千册，这对于年逾花甲的老专家来说是个大难题。

四是科研经费短缺。有关政策规定，非职务发明是没有科研经费的。退离休人员搞科研只能算是非职务发明，是得不到科研经费的。没有经费搞科研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复印资料要钱，单位里实验室不能无偿使用，实验用的材料需要经费才能购置，没有经费实际上就是不能再搞科研工作了，上百万科研大军就这样被堵在了科研发明之外。

五是缺乏科研助手。已经退离现职的科技专家基本上不会再为其配备科研助手，要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也只能单枪匹马，事无巨细都要自己动手；有的只好找自己子女帮忙。

当年上海退离休科技人员的尴尬境遇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这意味着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存在着老年科技人才严重浪费的问题；党和政府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意识到：这个老年退离休群体如不加以重视和引导，其后果将不仅仅是对老年科技人才不重视这么简单，伤害的是他们的心，是他们继续为国家作贡献的积极性！

2. 中国最大民间组织诞生记

正是依靠这些老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才使这个刚刚从旧社会解放出来的新中国得以“一唱雄鸡天下白”，使伟大祖国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但是，“文革”十年最先受到冲击的也是他们，把这些对国家发展和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知识分子变成国家机器的专政对象。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焕发了青春活力，成为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现在，他们退休了，他们还有时间和精力，尤其有着丰富的科研经验和一腔拳拳报国之心，我们怎能不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但是，在一些地区和部门非但没有把他们作为发展的动力反而被视为负担，甚或担心他们抢了自己

的“饭碗”。“我们还吃不饱，他们又来抢饭碗。”这种狭隘的自利意识在许多在职人员那里表现得相当强烈，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退离科技工作者的报国热情，如果蔓延开来，还极有可能引发大波澜。

数百万离休干部，80多万科技工作者，如何变负担为积极因素，不仅仅是中央也是地方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1989年9月25日，省委书记孙维本在黑龙江省从事科技工作45年以上、有贡献的老科学家纪念、表彰会上，就充分发挥离退休科技人员作用问题有过这样一段讲话，也一直是该省老科协的工作方向：“黑龙江省科技人员，不要说专家，不是多，而是缺，奇缺。”对于如何发挥老科技工作者作用问题，我们一定认真对待，孙维本说的是奇缺，这不仅是一省对科技人员需求，全国各行业各系统都奇缺。人才断层，这不是一两句话说清楚的事情，也不是睡一觉就能解决的问题。“文革”带来的影响十年后依然存在，表现在科技人才层面上更为明显：一方面是科技人才奇缺，一方面又没有离退休科技人才发挥作用的空间。

中央很快发现：必须迅速补上这个巨大的人才资源的漏洞。

1985~1986年期间，中国科协政策调研室曾就如何组织退离休科技人员再作贡献，组成调研组展开专题调研。他们发现，影响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再作贡献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和政策保障。随后，他们根据调研结果起草了一份文件《关于发挥离退休科技专业人员的作用的暂行规定》，由中国科协发出征求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国家科委、人事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七个部门的意见，得到一致同意后，1986年9月，以党、政、军有关部门和中国科协的名义联合向中央提出《关于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暂行规定》。同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以中办发[1986]32号文件将此规定下发全国执行。

中办发[1986]32号文件的下发，给了广大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和已经成立了的地方退协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从而促进了退协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广大离退休科技工作者不再悲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再把自己在科研事业上的再次辉煌留待“来生”实现，有了“32号文件”，他们变得更主动更迫切了，这个科研事业上的第二春，自己人生中的老来春，怎能不让他们倍加珍惜？

“32号文件”是促成退离科技工作者老有所为的第一份具有纲领性质的政策文件。提出了这个群体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对各级政府提出了具体

要求。这个文件之后，全国数省（市、区）给予积极回应，出现了以老专家、老教授为主体的不同名称的协会，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文件颁布两年来，效果并不理想，有相当部分省、市还是风声大雨点小，有的连风声都没有，文件只是静悄悄地躺在档案柜里沉寂着，而在文件的落实上也出现了程度参差和地区不平衡的严重状况。

春雷催动春雨。有了“32号文件”，就要把它贯彻好，使用好，大雷声还要有大雨点。下一步怎么办？做什么？两年后的1988年，著名的“6·20座谈会”召开了。这次座谈会，立下了中国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团体联合会的第一块里程碑。

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田光华是落实中央“32号文件”一直以来的参与者，她见证了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成立前的整个过程。她对20年前的情况记忆犹新：

1982年2月，为了妥善安排新老干部有秩序有步骤地实行适当的交替，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决定》指出：“老干部离休退休以后，一定要很好地安排照顾，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并注意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应当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原则之一”。但是大家都注意到“32号文件”执行情况的不平衡。中办发[1986]32号文件的7个会签单位，就如何更好地贯彻进行了多次磋商。为了总结交流中办发[1986]32号文件实施以来的经验，中国科协受32号文件7个会签单位——中国科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国家科委、人事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委托，于1988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发挥退离休科技人员作用座谈会”，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6·20座谈会”。

上述各会签单位及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等8部门对座谈会的有关事宜进行了分工：由国家科委负责统一对外解释政策，解答问题；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负责协调联系各会签单位对有关政策措施的研讨；中国科协则负责建立全国性组织的有关事宜，并确定了座谈会的规模为百人。

1987年6月，田光华结束了中共中央党校一年的学习，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主管组宣部工作的陈泓通知她：“党组决定从学会部调你到组织宣传部工作。”

还没容田光华反应过来，陈泓书记就已经开始给她提工作要求了：

你到组宣部来，首先抓好两件事情：一是为加强中国科协与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联系，促进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缓解科技人才的断层危机，尽快把“青年科技奖”组织起来，争取明年在中国科协成立30周年期间首次颁发；二是为加强与离退休科技工作者的联系，促进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发挥作用，尽快把全国性的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团体组建起来。这是组织决定，既没有给她思考时间，也没有给她拒绝的机会。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领导的指示办。

于是，这个一直以来以联系学会、服务于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为主要工作对象的中年女干部，逐步把工作重点调整到联系、服务青年科技工作者和老年科技工作者上来。她到组织宣传部之后为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书记处的领导下，根据会签单位分工，开展调查研究和筹建全国性老科技工作者组织，也由此展开了田光华投身老科技工作者事务的峥嵘岁月。

经过大约一年的调研、沟通和协商，1988年6月20日至24日，北京西山总参管理局招待所，中办发32号文件的7个会签单位，共同召开了“全国发挥退休离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座谈会”，全国18个省的离退休科技人员代表和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团体的代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和部分全国性学会的代表，共约60人参加了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的目的，一方面是交流经验、研讨问题，进一步推动发挥退休离休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就成立全国性社会团体问题进一步研讨协商成立筹备组。对这个座谈会，中国科协、统战部、中组部、中宣部、国家科委、人事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都非常重视，派领导同志出席；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财政部、建设部、卫生部和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应邀列席。

田光华回忆说，当她和陈泓书记向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汇报座谈会筹备情况，请他到会讲话时，他非常高兴地表示同意。在座谈会上，钱学森着重指出：“老年问题是当今世界及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退休离休科技人员是‘后继有人’，也就是越来越多，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老年问题已经成了一门科学——老年学；退休离休的科技人员，在离开工作岗位刚退下来的时候是专家，假如你退下来后不继续学习，恐怕不要太久，你就成不了专家了。所以，年长的同志也需要不断地更新知识，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科协得抓这个问题。因为你退休离休了，不在岗位上，科协作为群众组织对他们就应该十分关心。要从实践当中不断地找出新的途径，我想这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退休离休科技人员是能够大有作为的。

对于中国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团体联合会的成立，这次座谈会是又一座里程碑，其成果对于成立中国老科协所起到的作用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

座谈会期间，与会者就会签的贯彻中办发[1986]32号文件的有关政策问题，同建设部、卫生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的有关领导同志进行了座谈对话；对中国科协提出的《发挥退离休科技人员作用的意见》进行了讨论，后来，该《意见》，经修改后于1988年10月23日向各地方科协、中国科协所属各全国性学会发布。《意见》中明确指出：退离休科技人员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科技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中间大部分人能够继续从事科技经济及管理活动，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能优势。正确认识和发挥这支科技力量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退离休科技工作者是各级科协、学会开展工作活动的依靠力量之一。关心他们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基础上达到老有所为、健康长寿，这是各级科协、学会的重要工作，都要列入议事日程，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认真做好。

此次座谈会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就成立全国性退离休专业技术人员社会团体进行专题研讨。大家认为，目前全国各地退协组织发展很快，地、市以上的退离休科技工作者社团已建立了120多个，会员人数达5万多人；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一是各自为政，缺乏统一领导；二是各地区组织发展不平衡……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为此，出席会议的各地退协代表发出联名倡议，应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退离休科技工作者组织来承担这项任务，以保证退协团体的健康发展。代表们指出：成立了这样一个全国性组织，就可以有效地联系、团结、组织退离休科技人员发挥作用，对于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十分必要。它既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聚拢掌握着各种专业知识并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又能满足退离休科技人员继续发挥作用的愿望和需求。

为了把这一提议落实为具体行动，座谈会期间成立了由中国科协牵头、11个省、市的退协组成的“中国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团体联合会”（后来在许多文件中也被简称为“退科联”）筹备组，筹备组的主要成员有：

中国科协直属单位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协会 会长 黄汉炎

北京市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协会 秘书长 向明

上海市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协会 秘书长 陈琳

重庆市退休工程师协会 理事长 王登铭

北京市退（离）休医务工作者协会 副会长 石羽